

从复兴社到三青团的组织演变

贾 维

台湾学者邓元忠先生在其所著《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一书中提出：“具有六年多历史的秘密组织——力行社——在民国二十七年六月武昌会议后，算是告一段落。但就其社员对国家的影响力之继续增长一点看，力行社的结果，只是从一种组织形式改组为另一种形式。而直接继承力行社的成员与使命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虽然三青团的组成包括了很多非复兴社的分子，但就其基本成员与使命看，说三青团就是复兴社改组后的公开组织，乃是一历史的事实。”^① 邓先生指出了复兴社与三青团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强调了前者对于后者的深刻影响，对于我们加深理解社、团关系无疑具有重要帮助。但是，如果将复兴社改组为三青团，仅仅视为“也即是这个组织由秘密而转变为公开”，则容易使人对两者关系形成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念。事实上复兴社的组织毕竟解散了，而三青团却是重新组建的。

关于复兴社与三青团的关系，台湾学者王良卿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关系研究》一书中提出：“复兴社在多数逐步开展团务的省份都建立了一套‘社’与‘团’的衔接模式，以确保既有基础不致急速流失，并谋力量转化与扩充。”他又说：“复兴社既有的地方组织资源，含各人民团体（商会、工会、学生会……）等，也透过‘社’、‘团’的衔接程序，转换成三青团的团务发展和社会动员基础，这对于复兴社而言系实力的保存与再造，对三青团来说，的确也提供了工作进展的

^①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第323页。

的便捷管道”；“三青团经由复兴社原有资源扩展而成的结果，使得两个团体之间具备令人注目的、广泛程度的承继关系”。^①王先生提出的“社一团衔接模式”或“社一团衔接程序”，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它可以为我们研究复兴社与三青团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可惜的是，王先生本人对这一“衔接模式”却有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从组织和干部的角度，分析从复兴社到三青团的演变过程，并以重庆、湖南、甘肃、浙江等4个支团作为实例，探讨这一演变的方式和特点，以进一步说明复兴社与三青团的关系。在抗战时期，上述4个支团中，重庆、甘肃属于后方团部，湖南、浙江属于战区团部，而没有包括边疆地区和沦陷地区团部。笔者作这样的选择，其中除了资料方面的考虑外，主要原因是试图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三青团与复兴社的关系之上，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由于资料的缺乏和笔者能力所限，这一探讨只能是初步的，其中各种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一 康泽的地位和作用

在由复兴社到三青团的演变过程中，康泽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由国民党派送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历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力行社（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对于社、团演变来说，康泽之所以重要，因为他是复兴社最后一任书记长，又是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首任处长，复兴社组织由他负责结束，三青团组织又由他负责组建，他是从复兴社到三青团这一转变过程的实际操作者。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不研究康泽的活动，就难以理解复兴社是如何转变为三青团的。

康泽是力行社（复兴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贯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以部分国民党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发起成立了以拥蒋反共为宗旨的秘密政治组织“力行社”。康泽积极参加了有关的发起和组建活动。这个秘密组织分为

^①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第55～56页。

三个层次，第一层核心是力行社，为最高决策机构；第二层是革命同志会（分为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为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机构；第三层是中华复兴社，为领导群众，直接执行决策的机构。这三层实际上只是一个组织，其核心与领导成员都是相同的。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将上述秘密组织简称为“复兴社”。复兴社组织从中央到基层分为四级：中央为总社，省级为分社，县级为支社，区级为小组^①。复兴社成立后，康泽担任总社干事和宣传处长，负责主办复兴社机关报《中国日报》，大肆宣传“安内攘外”、“复兴民族”、“拥护领袖”等主张。此后又担任了革命青年同志会书记，在文职人员和教师、学生中间吸收成员，扩展组织。^②

使康泽在复兴社中独树一帜、自成系统的，是他所主持的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和军委会别动总队两个机构。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江西苏区的“围剿”，1933年在南昌成立了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后迁往江西星子县，简称“星子特训班”），由康泽任班主任，对军校毕业生和招考的政工人员进行短期培训。在复兴社所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星子特训班是持续时间最长、培训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曾被蒋介石誉为“革命的正统”，因而名声大噪。随后，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别动总队，由康泽任总队长。别动总队是为了“围剿”苏区而组织的特种武装宪兵部队，负责进行清查户口、编练保甲、训练壮丁、构筑碉堡等活动，推行新生活运动，同时进行“清剿”和反游击作战。别动总队先后成立了6个大队，活动范围遍及豫、鄂、皖、湘、赣、苏、浙、闽八省，成为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的得力工具，当时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军校特训班和别动总队的建立，使康泽有了自己的文武班底和政治资本，他在复兴社中的地位也不断攀升，开始与贺衷寒、胡宗南、戴笠等人并驾齐驱。

还值得一提的是康泽在四川进行的活动。1935年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进入四川。蒋介石组织参谋团入川，指挥川军实行围追堵截。康泽奉派兼任参谋团政训处长，率领别动总队入川，进驻重庆、成都等地，在当地大力发展和建立复兴社组织，并对川、滇、黔地方实力派进行分化、拉拢，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迅速渗入西南铺平了道路。康泽在四川把别动队、政训处、国民军训会以及复兴社四川分社和重庆支社的工作联系并统

①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90页。

② 参见康泽：《复兴社的缘起》，《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一起来，成为这一系列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由于康泽所主持的各项活动“日形重要”，他在复兴社内“有逐渐独立之势”。^①

康泽是复兴社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在他之前，滕杰、贺衷寒、刘健群、鄞悌、邓文仪、郑介民等人曾先后担任这一职务。康泽简要地回顾了他接任该职的经过：“1937年9月间，我接替了复兴社总社的书记职务以后，我决定的步骤是，先了解并清理总社的工作情形，然后再了解并清理各地方组织。蒋介石核准了我这个步骤。”^②据说，康泽就任后便大量布置他的亲信于复兴社各省市分社，并更换了许多分社书记。^③

康泽接任复兴社领导职务之日，正是该组织内部四分五裂、趋于涣散之时，颓势已经难以扭转。据研究者云：康泽“作事负责，从不苟且，亦无嗜好，生活严肃，并重然诺。……但由于他的胸襟不够宏大，认为组织须由他来领导，故对以往的任何作书记的人，都表不满，在力行社的后期，他只注重发展自己的别动队，置社务不顾，亦不参加力行社的干事会。他出掌书记时，组织已接近尾声，加上抗战的急务，使他无能为力。”^④但康泽本人可能也不曾料到，他接任复兴社书记长后的一个主要任务，竟是办理复兴社组织的结束事宜，成了名副其实的复兴社终结者。

二 复兴社组织的结束

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放弃了“安内攘外”的政策，接受了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积极准备对日抗战。1937年春，蒋介石考虑到国内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解散党内各种派别小组织而代之以一个新组织，以求全国青年“新的团结与集中”的最初设想，并授意某些复兴社的领导成员分别草拟改组计划以供参考。1937年6月22日，贺衷寒于出国考察前赴庐山谒蒋并呈递复兴社改组计划书。7月初，滕杰等人也以复兴社干事会的名义提出了改组计划。随着“安内攘外”政策的放弃，已经存在6年之久的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复兴社，它的结束和

① 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第58页。参见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104页。关于康泽生平参见陈开国《康泽事略》，《重庆文史资料》第41辑。

② 《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42页。

③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

④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513页。

改组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除了形势和政策的改变，复兴社之所以结束，还有其内部的原因。“据滕杰的回忆，改组力行社的理由有三：一为国家已经统一，但青年组织尚未统一；二为国民党的组织与力行社之间的摩擦，对党有很大损害；三为力行社内的同志已不可能团结。”“抗战促成了全国一致的感觉，却未能加强团体的力量及一致性”^①。从1933年起，复兴社领导层就开始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这场权力斗争的焦点是‘谁将会继承蒋公的地位’，此问题的实际意义是争夺在蒋氏下的第二席地位。例如，滕杰原来存心推崇贺衷寒为蒋氏之下力行社领导人；胡宗南有戴笠的帮助，且在黄埔同学中与军中很受拥护；而康泽更是雄心勃勃，后来滕杰亦自成中心。他们都是蒋氏的得意门生亲信，力行社的湖南派、浙江派、西南派和江苏派即是以他们四人为主角。”^②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致使“团体革命情绪低落”，其成员对团体的向心力不复存在，也使蒋介石对复兴社的态度日趋冷淡。

1938年2月5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复兴社高级干部举行自西安事变以来首次较具规模的社内干部会议。会上蒋坦陈复兴社诸多缺失，“其中最坏的一个现象，就是内部自相摩擦，招致外人攻击，或者是幼稚骄傲，债事招怨”。复兴社的种种不佳表现，更坚定了蒋介石实行整顿改造的决心。他要求大家就筹建三青团问题，“多多商议，总要形成党内有一个重心，有一个精神，来管束支配指导一切。”^③

为复兴社办理结束事宜的任务落到了复兴社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的身上。从康泽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他处理团体结束事宜的原则和办法。“1938年3月初，酝酿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解散复兴社的时候，我曾提出几个问题请示蒋介石。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召集一次复兴社大会，传达解散复兴社的指示？’蒋答：‘可以。’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十分肯定地答：‘当然这么做。’第三个问题是：‘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各地的复兴社的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蒋也是肯定地说：‘当然这么做。’第二、第三两个问题我又写成书面报告呈蒋批‘可’之后，作为

①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517、512页。

②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261~263页。

③ 蒋介石：《对高级干部的期望》，蒋自称是“西安事变以来（对复兴社）第一次最重要的训词”。转引自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第37页。

根据去做了。”^①

由康泽提出、而为蒋介石所认可的结束措施，就是寥寥三条：召开复兴社代表大会，宣布解散；将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青团；复兴社社员可以根据其志愿，率先入团。其中第二条似乎肯定了复兴社对于国民党的贡献，但内容十分抽象；第三条似乎承认了复兴社员在三青团内的优先地位，然而没有明确的具体规定。对于一个像复兴社那样曾经对国民党政权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秘密团体，如此结束确实显得过于草率了一些。

接下来，在康泽的主持下，中华复兴社于1938年5月中旬在武昌大江中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正式结束。据康泽回忆：“复兴社这一次的代表大会，是在1938年4月间在武昌举行的，出席的代表约百人左右。临开会时，蒋介石在开封未回，来电报指定陈诚代表他出席指导，大会前后开了三天。主要是宣布并讨论‘遵命’结束的问题，由我作了报告，并提出讨论后，曾作了决议。大意是：‘因抗战的需要，青年团行将成立，团体（指复兴社）的历史任务终结，应即遵照领袖命令解散，而将团体的精神与宗旨，移植于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所谓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也曾作了讨论和决议，大意是：‘在团体解散之后，青年团成立时，所有全体同志，可根据志愿，在各地踊跃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从这两个决议，可以说明三青团与复兴社的关系。复兴社在这最后一次的代表大会时，在我的记忆中，力行社社员、复兴社社员及其外围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以及各地方又分别成立的外围，如忠义救国会之类分子，共有五万余人。我以复兴社最后一任书记，在形式上负责把复兴社的组织作了结束，而事实上把它移植到三青团，成为以后三青团的主要骨干。”^②

复兴社的匆忙结束、草草收场，在外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而给它的许多成员却留下了工作失败、组织死亡的惨淡印象。社员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团体要结束，召集代表大会，这是最后一次大会。大会有何意义？昭示团体过去工作的失败。”^③另一位社员黄通回忆说：“我们私下称

①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204页。

② 《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47页。关于复兴社在武汉召开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时间，各家说法不一。根据《唐纵日记》记载，似以1938年5月中旬为宜。关于复兴社成员的人数，邓元忠估计达到50万人，见《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115页。

③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第74页。

这个会议为‘奉安会议’，因为在这个会议里团体死掉了。想当初大家下了多大的决心参加复兴运动，宣誓之后，完全献身团体，如今一句话就解散了，重新成立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那以前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呢？”^①他们就怀着这样一种迷茫的心情，离开了已经宣告解散的团体，去重新寻求自己的出路。“并非每位复兴社员都参加了三青团。滕杰认为参加三青团的只是原来复兴社员总数的一半。大多数的复兴社员于以后数年中在三个系统的机构内服务，一为政工，一为特务，一为三青团。”^②它表明复兴社成员在团体解散之后开始分流。

即使复兴社成员加入三青团也并非那么简单。社员转变为团员，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在内部仍然存在分歧。“复兴社员之转入三青团，并无任何特殊手续，只需宣誓即可，为如何转移社员一事，康泽与邓文仪曾有所争执。邓氏主张集体入三青团，康氏则主张个别入团，最后采取折衷办法，即凡属于一团体者，经过个别鉴定后，集体宣誓入三青团。”^③康泽主张复兴社员个别加入三青团，似乎大有深意。复兴社是一回事，三青团又是一回事，新组织有新组织的规矩。问题在于，究竟谁能代表三青团呢？换句话说，由谁来掌握组团工作的主导权呢？

三 三青团的组建

三青团在组建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复兴社的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一下蒋介石为建团规定的主要原则。三青团在南京开始最初酝酿之时，蒋介石提出了他的基本设想。据康泽回忆：“第一次会是1937年9月中旬在南京中山陵园蒋介石别墅。他对我们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④

1938年5月下旬，蒋介石在武汉与康泽的谈话中，对建团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据康泽回忆：“蒋介石某一次叫我去，我又向他请示关于三

① 陆宝千访问、郑丽榕记录《黄通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174页。

②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522页。

③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521页。

④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7页。

民主义青年团的问题。我说：‘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他答：‘当然复兴社是核心。’我又提出另一个问题问他：‘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的组织，将来相当的庞大，相当的复杂，要把工作作好，需要有一个作重心。’他答：‘当然你是这个工作的重心。’这时，我很感激他对我的信任，因此我就更全心全意地遵照他的指示去做了。”^①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关于建团问题上，蒋介石对康泽确定了如下三项原则：第一，三青团与复兴社不同，它不是一个秘密的小组织，而是一个公开的大组织，它要将复兴社、CC派、改组派都团结在一起。第二，复兴社是三青团组织的核心。第三，康泽是三青团中央团部工作的重心。我们姑且将它称为“建团组织三原则”。这三条原则比起复兴社结束时提出的那两条规定要更为具体一些。但因为涉及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和人事背景，自然无法公开，在团章上也没有反映，它只是蒋介石与团务工作负责人的一种内部约定。但从建团过程来看，这三条原则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发生作用的。如果说，从复兴社转变为三青团，存在某种普遍的“衔接模式”，那么它的基础就是这三条基本原则。

以复兴社作为三青团组织的核心，在刚刚成立的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及其工作机构中，已经有所表现。在中央临时干事31人当中，复兴社只有4人，康泽、贺衷寒、胡宗南、陈良列名其中。在中央团部7个处室中，复兴社完全掌握的有组织、总务两处，但在11位副处长中，复兴社就占了7位。可见，复兴社在中央团部机构中，采取了避虚就实、轻上重下的方式。康泽不无得意地说：“虽然受到陈立夫和陈诚两方面的压力，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在中央临时干事会中，复兴社在实际上还是占到了最主要的地位。”“从副处长以上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复兴社分子，占了优势。至于处以下，各组组长这一级的人员中，复兴社分子所占比例更大。例如，组织处所属六个组——普通、战地、学校、海外、女青年、登记——的组长全是复兴社分子。组以下的工作人员，也是复兴社分子占绝对多数。”^②中央团部组织处简直成了复兴社分子的大本营。

以康泽作为三青团的“工作重心”，也开始体现出来。康泽当时虽然地位并不高，却是炙手可热，权倾一时。“我当时除了在组织处负实际责

①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205页。

② 《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107-108页。

任外，通过分布在各处和各组的复兴社分子，在中央临时干事会，使我形成了事实上的人事联系中心和工作推动中心。我的意见，在各处都被重视和发生效力，无论陈诚或陈立夫愿意不愿意。这是复兴社结束时的决议，也是经过蒋介石裁可的方针，同时也是我尽力布置和争取的结果。而蒋介石则是在事实上默认和庇护我这样去做的。”^① 康泽到处扮演着复兴社遗产接收人的角色，连复兴社总社的机构和档案也是如此。

康泽在中央团部所处的这种关键地位使他成为内部斗争的焦点之一，陈立夫、陈诚的反对尤力。陈立夫认为：“康泽为组织处处长，康这个人很有野心，他希望青年团是另外一个组织，和我的构想完全不同……他要成为青年团的领导人物，将来可取党而代之。”^② 陈诚是中央团部书记长，对复兴社一直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康泽“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不宜担任组织处长。在他的反对下，三青团成立时，康泽只能“代理”组织处长职务。在中央团部康泽虽然是陈诚的下级，却目无上司，越权报告，自行其是，使陈难以容忍。陈诚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处处抑制、打击康泽。康泽愤愤不平地说：“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一开始陈诚就和我搞不好；根本原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复兴社为核心的经过，他不知道；他在蒋介石面前争权，自然要嫉妒复兴社，反对以复兴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核心。由于复兴社的内部事务，蒋介石比较地照我的意见办，所以陈诚就集中地反对我。”^③ 康泽与陈立夫、陈诚的冲突，前者是党团矛盾的起点，后者则是中央团部权力斗争的开始，它们对三青团的发展乃至康泽本人的政治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 三青团最初的干部来源

干部构成组织的核心。从团的角度讲，为了建立和发展组织，必须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对康泽来说，他虽然已经成为中央团部的“工作重心”，掌握了组团工作的主导权，但是如果不建立相应的干部系统，这种主导权仍然无法得到贯彻和保证。三青团的干部系统就是在这样双重的需要之下形成的。分析三青团最初的干部来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三青

① 《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108页。

②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226页。

③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205页。

团组建的过程，以及与复兴社的关系。

三青团成立之初，为了发展组织，培养干部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当时三青团本身的干部训练机构尚未建立，只能通过与复兴社有关的训练机构，吸收复兴社的青年干部资源。其中之一是江陵留日学生训练班。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参加抗战。1937年11月，中央政治学校在江陵开设留日学生训练班，专门对留日学生进行政治训练。不久，留日学生训练班又划归中央军校特训班系统，由康泽负责主持。当时正值抗战，特别需要了解日本情况的人才；加上这批留日学生中间原来就有复兴社组织，回国后又大批加入复兴社，因此受到复兴社和康泽的特别重视。在康泽的安排下，他们从训练班结业后，率先加入了三青团，其中一部分（约20余人）被分配到中央团部工作，成为三青团团务工作的重要骨干。

但仅仅留日学生远远不敷使用。为了较大规模地培养三青团的干部，以开展团务工作，中央团部决定举办团务干部训练班。1938年8月14日，在武昌珞珈山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内开设了第一期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学员约600余人，分别来自战干一团、复兴社和中央政治学校。青干班对三青团今后的发展关系重大，因此国民党内各个派别都纷纷插手，试图施加影响。为了掌握青干班的训练教育，康泽付出了极大精力。他利用多次讲课的机会，大肆宣扬三青团是国民党的“新血轮”，要发挥先锋队的作用，强调团的独立性，博得了多数学员的同情和支持。他还以三青团组织工作负责人的身份，对学员进行鉴别和联系工作，使他“在事实上形成了这批受训人员联系和团结的中心”。为了防止CC势力渗入三青团，他对CC方面所选送的学员，以各级团部尚未普遍建立，一时派不出去为理由，将其一并送军委会政治部分派到部队担任政训工作，以此来保证青干班学员在政治上的“纯洁性”。^①青干班第一期学员的分派工作，完全由康泽掌握。除了一部分学员分派到中央团部工作外，其余大都按照其籍贯，分往各省地方团部工作。随着这些干部被先后派往各地，团务工作也就在各地开展起来，他们成为三青团各级地方组织的骨干。

分析三青团早期干部的成分，可以看出如下特点。经过康泽的努力，已经将军校特训班、政校留日班和青干班学员融为一体，从而实现了由复兴社干部向三青团干部的过渡。这批由复兴社成员转变而来的青年骨干，成为三青团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干部来源。他们虽然大都来自复兴社，但除

^① 《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111页。

少数人外，多数只是复兴社的基层骨干或新进成员。他们对复兴社的关系已逐渐淡化，而对三青团和康泽则形成紧密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因此，我们已经不能将他们简单地视为复兴社成员，他们是正在形成的三青团干部系统的代表。三青团内根基最深、影响最大的一个派系——康泽系也由此产生了。三青团干部的这种政治面貌，要一直等到6年之后蒋经国的赣南系和干校系在团内崛起之后，才会有所改变。

五 从地方支团看社、团转变

地方团部，是三青团组织中分量最大，也是最为复杂的一部分。中央团部成立后，各地方团部如何组建，就成为国民党内争执的焦点，各派力量纷纷插手，企图抢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参加争夺的，不仅有CC派，而且还有复兴社内的各个派系，情形十分混乱。为了使建团工作有序进行，国民党中执会不得不一再通令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各级团部的组织，应由团长派人进行，各地不得擅自进行。”

组建地方团部的关键，是干部人事的配备，既要保证团务的贯彻，又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康泽回忆说：“关于三青团各地方团部的人事，蒋介石曾指示我：‘青年团各地方的负责人，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所定标准选派，不要像党部那样迁就。’因之，我就根据他所指示的考虑。对于各地方的干部配备，我当时曾提出了两项原则：一、要有广大的容纳性——不问哪派哪系，只要合于三青团的条件都可以；二、要有重心作用——复兴社分子在里面须要占到主要地位。这些省（市）支团筹备处的主任，除了山西、广西、广东比较例外，安徽方治是一个CC分子，也是一个例外而外，其余多是复兴社分子或接近于复兴社的分子。书记除了广西的程思远外，其余全是复兴社分子。……总起来，三青团各地方团部虽少数地方对地方势力有所迁就，但基本上仍是复兴社分子占绝对优势。”^①

由此可见，康泽组建地方团部所依据的仍然是蒋介石所规定的那三条原则，只是他在叙述的时候，将以复兴社为核心和以康泽为重心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别，考虑到康泽此时是作为中央团部的代表，以及复兴社本身派系林立，这种差别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从康泽对各省市支团部（除去少数地区的特殊情况）的人事安排来看，主要是采取三

^① 《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112~113页。

种办法。首先,在各支团部干事会组成上,尽量包括复兴社、CC和其他派别的代表,以符合所谓“具有广大容纳性”的原则。其次,在各支团部主任职务的安排上,尽量安排由当地黄埔系—复兴社头面人物来兼任,以保证所谓复兴社的“核心”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当地复兴社势力对团务的关照和支持。再次,对各支团部书记、组训组长,以及各分团主任、书记等负责实际团务的职务,则尽量配备政校留日班和青干班第一期学员,以体现所谓的“康泽重心”原则。

康泽曾经为了配置地方团干而煞费苦心。在三青团成立两周年之际,他回顾各地团部的组建过程,不无感慨地说:“组织之建立,最主要最困难的问题,是干部的遴选,因为选派一个干部,不但要顾及他本身的知能经验和兴趣,而且更要顾及他与他周遭的环境是否适宜……更须要求他与他工作地区的社会关系的谐和”;“负责实际团务责任的多数为新起的青年,这些青年虽然具有高度的工作热忱,但由于资望与经验的不足,在推动工作上免不了要感到困难。”^①很明显,他这里所说的“新起的青年”,就是指上述由政校留日班学员和青干班第一期学员组成的三青团早期干部,正是他们在团内担负着“实际团务责任”。

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配置干部,关键问题都是要协调旧有的复兴社组织与新兴的三青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影响团务工作发展的,除了地方势力、CC集团外,还有复兴社组织本身。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社、团矛盾或新旧矛盾,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三青团组织的发展和稳固。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地方团部的组建,社、团关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由于各地社、团关系的性质不同,从复兴社到三青团的演变过程,就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以湖南、甘肃、重庆、浙江4个支团为例,它们从复兴社到三青团的转变,就分别表现为新派主导、新旧冲突、新旧融合等三种不同类型。下面分别叙述之。

(一) 新派主导型——湖南、甘肃支团

湖南是复兴社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最多时曾经达到5万余人。在复兴社领导人中间,湖南籍成员也占有很大比例,如贺衷寒、邓文仪、鄧悌、萧赞育等都是湖南人。曾经担任复兴社湖南分社负责人的先后有蒋鹏

^① 康泽:《团的使命与两年来的组织生活》,《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7月9日。

翦、仇硕夫、李一民、贺醒汉（贺衷寒胞兄）、滕杰、李树森等人^①。湖南支团组建时，如何处理与湖南复兴社组织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康泽在组建各省市支团时，为了慎重起见，往往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即先在省会成立中央直属区团部，到条件成熟时，再将区团部改组为支团部，如四川、甘肃、河南支团都是如此。湖南却与此不同，而是分头进行。一方面中央团部指定长沙警备司令鄧梯为湖南支团筹备处主任，李一民、仇硕夫等人为筹备员；同时又派政校留日班学员刘业昭、周天贤等人负责筹备长沙区团部，刘、周二入深得组织处长康泽信任。鄧梯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复兴社总社第四任书记长。康泽对他的印象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他不买谁的账，谁也不买他的账；他不顾事实，事实也就叫他做不通。”^②康泽与鄧梯无法合作，导致以复兴社湖南分社旧班底为主的湖南支团部筹备处，和以政校留日班学员为核心的长沙区团部筹备处之间，隐然出现了新旧对立。

一场突发事故成了解决问题的契机。长沙大火发生后，长沙警备司令鄧梯被当作替罪羊枪毙了。因此中央团部命令湖南支团部暂停筹备活动，改由长沙区团部负责。1939年9月2日，湖南支团部筹备处在长沙成立，由省警务处长李树森兼主任，李一民、仇硕夫等任干事，刘业昭任书记，周天贤任组训组长。这是一个新旧搭配的班子，但新旧之间依然难以合作。“中央团部调派筹建湖南支团的几个主要骨干，都是留日学生训练班毕业的，他们对湖南情况不太了解。中央团部组织处曾嘱咐他们到湖南后，找原复兴社在湘的负责人接洽。他们找了原复兴社湖南分社干事兼（助理）书记龙步云，希望他拿出原复兴社成员和干部名册，以便从中挑选骨干，但被拒绝。”^③支团部只得将中央团部派来的田俊杰、贺燧初等30名青干班一期学员分别派往各个行政专区，全省团务才逐步开展起来。

尽管这批新干部地位较低，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利用各种关系，经过积极活动，终于掌握了湖南团务的主导权，而原来的复兴社势力反而成了陪衬。据一位当事人回忆说：“省党部委员仇硕夫，黄埔系出身，复兴社成员，兼任三青团湖南支团部监察会常务监察。自以为资格老，想垄断一切，但三青团实权落在留日学生周天贤、刘业昭等人手中，

①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105、115页。参见仇硕夫《中华复兴社在湖南的活动》，《湖南文史资料》第32辑。

② 《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41页。

③ 王进三：《三民主义青年团湖南支团始末》，《湖南文史资料》第32辑，第61页。

仇颇不甘心。”又说：“三青团湖南支团部干事长兼湖南警务处处长李树森，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军师长、军长，系复兴社成员，他见周天贤等都曾留学日本便待之以礼。同时，李知道这些留日学生都成了陈诚、贺衷寒、康泽等人的得力助手。他们大都是各省、市三青团的骨干。李也想利用他们的关系，故对他们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每逢复兴社分子或黄埔系人员非难周天贤等人时，李以‘老大哥’的身份出来作挡箭牌，别人投鼠忌器，不便下手。等到周羽毛已丰，反周者也只好改变态度，争呼‘雅公’（周天贤号雅南）了。因此，名为三青团湖南支团部干事长的李树森，大权落到了周天贤等人的手中。”^①

甘肃支团的情况与湖南类似。1939年7月，甘肃支团部筹备处成立时，由胡维藩任主任，他是原甘肃复兴社的负责人，公开职务是甘肃国民军训处处长。寇永吉任书记，寇是日本留学生，抗战爆发后回国，入江陵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完毕后，即调到中央团部组织处任干事，受到组织处长康泽的格外垂青，这是日后寇氏在甘肃支团独揽大权、地位扶摇直上的主要原因。支团部组训组长和宣传组长由青干班一期学员张开选、罗麟藻担任。寇永吉与张开选等经过商量，对于支团部人事形成一致意见，决定以青干班人员为领导中心，以甘肃人为任用的范围，对于原甘肃复兴社负责人胡维藩和他所布置的人员，则采取疏远甚至排斥的态度。胡维藩虽兼任筹备处主任，但不能经常到团部办公，因而大小事务，起初是由寇永吉负责处理，向胡汇报，以后便逐渐形成了寇永吉的独断专行，最后干脆将胡推到有名无实的监察会去，由寇取而代之了。^②这是旧派在团内逐渐失势、由新派主导团务的又一个例子。

（二）新旧冲突型——重庆支团

康泽曾经是西南地区复兴社的总负责人，现在又以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的名义指导重庆支团的组建，一人而社、团两种身份兼而有之，照理来说重庆支团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然而颇出人意料，重庆建团并不顺利，新、旧之间仍然出现了尖锐矛盾。重庆支团部主任的人选，康泽提名由陈介生担任。陈介生是黄埔五期学生，德国留学生，曾任复兴社柏林分社书记，

^① 叶国霖：《薛岳统治湖南时期的党团斗争内幕》，《湖南文史资料》第36辑，第2、13页。

^② 张开选：《三民主义青年团在甘肃的始末》，《甘肃文史资料》第3辑，第68-69页。参见张开选《三青团在甘肃兰州建立机构和发展组织概况》，《兰州文史资料》第1辑。

三青团成立后任候补中央干事，在社内和团内都有一定地位，与康泽也有较深的关系。陈介生就任后，在支团内安置了一批留德学生。重庆支团部书记由袁宇人担任，袁系原复兴社重庆区社书记，组训组长吴兆棠也是德国留学生，副组长高允斌则是原复兴社重庆负责人之一。此外，康泽又选派陈开国、张其学等20余名青干班学员到重庆支团工作。

1938年10月初，陈介生由武汉到重庆筹建支团，他向原复兴社重庆区社传达复兴社解散，社员志愿加入三青团者，按《团章》规定办理，一切活动公开，还限期要原负责人交出社员名单。当即引起新旧间的严重矛盾，造成袁宇人（原复兴社重庆区社书记）不就任书记职，而与陈介生唱对台戏的尴尬局面。为此，当三青团重庆支团筹备处的牌子在重庆市总商会门前挂出的晚上，即被人取下砸碎。直到年底，中央团部迁至重庆，经康泽亲自调处，重庆支团才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这种以三青团新干部为一方，而以当地原有的复兴社组织为另一方的新旧矛盾，对重庆支团的组建工作影响很大，也使康泽的处境颇为尴尬，不得不以中央团部的名义出面进行协调。在其亲信陈开国就任支团组训组副组长前，康泽对他明确指出，重庆支团新旧不和，双方都有责任，这个矛盾，将由中央团部来协调解决。他希望陈不要卷进某一方，多做和解工作，主要是迅速筹建市区各个直属分团，强调要尽量把青干班一期毕业交由重庆支团分配工作的二三十名干部适当地作出安排，以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发展团务出力。此后经过陈开国与复兴社重庆负责人磋商，才使团务工作在市区和所属郊县开展起来，但新旧矛盾仍然存在。直到1939年10月，中央团部免去陈介生的主任职务，派康泽亲信、原重庆复兴社主要负责人毛嘉谋兼任重庆支团部主任一职，受到各级新老干部的欢迎，新旧矛盾才算告一段落。^①

（三）新旧融合型——浙江支团

浙江是复兴社组织非常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组织和成员渗透到各个部门，全省72个县，几乎每县都有复兴社组织^②。浙江支团在成立之初，充分利用了原来复兴社的组织和人力资源，因此浙江建团过程出现了新旧融合的特点。

^① 陈开国：《三青团重庆支团述略》，《重庆文史资料》第41辑。

^②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105页。

浙江支团部筹备处主任由原复兴社浙江分社书记宣铁吾担任。宣铁吾是黄埔一期学生，时任浙江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是担任浙江支团筹备处主任的合适人选。支团书记则由康泽亲信、原复兴社浙江分社助理书记陈苍正担任。中央团部为了充实浙江支团组织，加强支团的力量，还从中央青干班派来王仲高、楼崇伦等20名干部，作为组织骨干，分配到各分团担任书记。

以宣铁吾、陈苍正为首的浙江支团部继承了浙江复兴社的基本格局，保持了浓厚的复兴社色彩。浙江支团成立后，“原来浙江复兴社书记宣铁吾一变而为筹备处主任，原来助理书记陈苍正为筹备处书记，复兴社骨干赵龙文、吴寿彭等则成为筹备处干事，一直到下面的秘书、组长、副组长之辈，凡是重要职位，大半由复兴社分子包干。所谓三青团浙江筹备处，实际上就是复兴社（浙江分社）的化身。”^①与此同时，浙江支团部又与中央团部和康泽保持密切的关系，积极使用中央团部派来的青干班干部，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干部，吸收成员，发展组织，将复兴社与三青团组织结合起来，避免了许多地区出现的社团矛盾和新旧冲突，从而开创了团务工作在浙江的新局面。因此，我们可以把浙江支团视为新旧融合的典型。

结 束 语

以上我们从组织与干部、中央和地方等角度，考察了由复兴社向三青团的演变过程。综上所述，从复兴社到三青团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虽然存在若干操作原则，但却并没有一种普遍的“社—团衔接模式”，而是因地因人有所不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从社到团的顺利衔接，很可能只是一种例外；相反社、团矛盾或新旧冲突倒是大量存在的。正是在这种新旧矛盾和新旧融合中，三青团逐步取代了复兴社，建立起自身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复兴社的时代结束了，三青团的时代开始了。而康泽也通过他的活动，给这一过程打下了自己的深刻烙印。它也提示我们，三青团虽然由承袭复兴社而来，但具有自身的许多特点，在研究中我们要注意研究这些特点，避免将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

（原文18000字）

^① 林泽：《浙江三青团的部分情况》，《浙江文史资料》第13辑，第140页。